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四八期 ——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205c)

【亡灵祭坛】	沉沦神州的血祭者	何与怀
【童年旧事】	文革时的“焚书”记忆	乔海燕
【史海钩沉】	首都红卫兵三司司令朱成昭	张蕴章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亡灵祭坛】

沉沦神州的血祭者

• 何与怀 •

—

2009年5月，缘因参加一个欧洲华文作家会议，我来到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麓多瑙河畔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是月24日，我来到这个维也纳最大也是全欧洲第二大的公墓。公墓占地二百四十公顷，十九世纪初奥地利帝国皇帝弗朗茨在位时修建，迄今一共安葬了二百五十多万人，现有墓穴三十三万座。这里以莫扎特纪念碑为中心，安葬着海登、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父子等二十多位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他们的墓穴呈半环形依次分布周围。

我来到贝多芬墓前。墓碑为白色大理石，锥形造型，简洁方正，其后三面有苍翠松柏围绕，正面底座上用黑色大字写着：“Beethoven”（贝多芬）。

我以虔诚恭敬的心境，前来瞻仰贝多芬之墓，更是出自一个原因——我心里思念着一件事情：

八年前的2001年，也是5月，有一位中国人，万里迢迢也来到这块我现在瞻仰过的贝多芬墓地前，徘徊良久。他神情肃穆，眼含热泪，喃喃自语。他在完成一件神圣的托付——代托付者向他所崇拜的音乐大师深深鞠躬，献上鲜花，告诉他有个中国学生是哼着他的《庄严弥撒》上天堂的。

当天晚上，这位中国人还特意在维也纳参加了一场音乐会，就在著名的金色大厅。当维也纳交响乐团上台演奏贝多芬《英雄交响曲》时，他触景生情，一下子眼泪如清泉般涌出，无法抑止。熟悉的音乐把他带进那苦难的“文革”年代，勾起了他对死去难友的深沉的追思……

这位中国人叫刘文忠，当年满怀信任交付他一个看似难以完成的重托的，是即将被枪决的难友，名叫陆洪恩。

二

我能和刘文忠先生联系上，并了解陆洪恩老师的案情，是通过和我同住在悉尼的好朋友江涛女士。

江涛于2000年即和夫婿乔尚明先生一起移民到了澳洲。她原名林志明，1933年出生，父亲是林子青居士。1956年，江涛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毕业，后来在煤炭研究院系统从事科技情报、翻译、外事工作，直到1990年退休。

前几年我在台湾出版了一部报告文学随笔集，名叫《北望长天》，书中写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中国甘肃一个叫“夹边沟”的农场“劳改”的三千名“右派”大都因饥饿死亡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也写了2008年“5.12”汶川地震中致使大量学童罹难的人祸；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如储安平、刘宾雁、公刘、昌耀、巴金、梁宗岱、郁风、王若水、杨小凯等令人唏嘘的坎坷命运，更写了文革中惨遭枪决的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沈元这些烈士和精英。

江涛读了《北望长天》，对我说，她读得泪流满面，多日不能成寐，常常回忆起那些亲身经历的暗无天日、是非颠倒的日子。她还说，想起在那些日子里，自己与这些坚持真理、誓死为真理而战的烈士相比，她真的是个“失去了重量”的“苟活者”！她以“LEST WE FORGET!”为题，为我写了一篇书评。文中说：

生活在澳大利亚这个南太平洋美丽的国家的我们，切勿忘记在太平洋北侧曾经抚育我们的祖国，切勿忘记所有那些曾经为了我们祖国的民主自由和美好未来而战斗和牺牲的中华儿女们。他们应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三

于是，江涛给我讲述一个人，一个我在《北望长天》中很不应该遗漏的人——他就是陆洪恩。

陆洪恩是江涛的表姐夫。他的父亲在上海一所孤儿院长大，十七岁时为一个天主教徒所收养，所以后来他们全家都是天主教徒，陆洪恩少时就读的法国人办的徐汇中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陆洪恩后来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并于1941年毕业。他和也是从上海音专毕业的胡国美交了朋友并且喜结良缘。而这位胡国美就是江涛的的表姐。1944年，江涛随父母由苏州迁居上海，与胡家表兄弟姐妹的联系频繁起来。他们两家人当年都住在上海常德路恒德里内，

江涛请胡国美做她到上海后的第一位钢琴老师，每天放学后便在胡家练琴。陆胡结婚后，江涛的钢琴老师改成了陆洪恩。

那时，江涛是一个初中生，十几岁的小姑娘，聪明伶俐，求知欲非常强，跟陆洪恩学习钢琴的那段日子成了她永远的美好回忆。

当时陆洪恩在上海艺术剧团的小型乐团里当钢琴伴奏，有时也给咖啡馆弹琴。江涛回忆说，表姐夫很会当老师，在其指点下，她激发浓厚的兴趣，居然每天可以一连练上三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陆洪恩规定江涛每天必须首先练音阶二十到三十分钟，要求掌握正确的手指触键姿势，然后要有力，最后才要求由慢到快的速度。音阶之后，就是练《车尔尼》，再逐步加练巴哈的二部创意曲、三部创意曲。只有在练好了以上这些练习曲之后，他才让练奏鸣曲和一些比较抒情的曲子。陆老师觉得江涛很投入，很用功，也有悟性，给她买了一本大大的《Masterpieces》让她练习。江涛记得，陆老师选给她练的第一首是 Chas. D. Blake 的《Waves of the Ocean》，此曲气势磅礴，令人陶醉于海洋的滚滚波涛中；第二首是 Gustav Lange 的非常轻快柔美的《Flower Song》……。这个阶段，江涛也开始听古典音乐和钢琴曲，尤其喜欢肖邦的作品。每次上完琴课，她都要请求表姐夫弹一首肖邦的波兰舞曲或夜曲，而表姐夫总能有求必应，信手弹来，就把波兰舞曲的奋勇激昂和夜曲的恬淡柔情充分展现出来，使江涛无限陶醉，并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弹奏这样的曲子。事实上，江涛的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曲子，即使后来三十年没有机会摸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她第一次买了自己的钢琴后，居然还可以比较熟练地弹出来，实在不能不说是他表姐夫严格要求的结果。

1950年1月，陆洪恩进入了上海交响乐团。这时已是共产党新政权。陆洪恩以无限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这个新政权，热情洋溢地施展了自己的艺术才能。1954年，才三十六岁的他被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和副指挥，上海市市长陈毅代表市人民政府亲自向他颁发了任命书。此后的几年中，他曾为苏加诺总统等各国首脑人物演出，还与捷克、波兰等国音乐家代表团联合演出，其中与苏联专家的合作演出尤其频繁。他总是处于非常忙碌的状态，然而，这几年也是他最有成就感和最快乐的时光。例如，他在1956年10月11日给江涛父母的信中就这样说：

……回沪以后，忙于工作，昨天刚搞完招待苏加诺总统的演奏任务。很荣幸，这位反殖民主义杰出战士还和我握了手。从反殖民主义的立场来说，咱们倒是志同道合的。就拿孙中山先生的学说来讲，“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弱小民族共同奋斗”这么句词儿，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完全能够实现中山先生的遗言，而且由于解放七年来党的努力，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亚洲的盟主了。

陆洪恩作为一个单纯的音乐家，只要让他有机会能发挥才干，就感激涕零，称颂不已。他当时显然由衷地信服和尊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共产党，以为从此毛主席共产党将会毫无疑问地把“新中国”带上一条前途无限光明的康庄大道。这时的陆洪恩，也可谓春风得意，步入了他人生的辉煌期。

四

但是，非常不幸，陆洪恩的性格特别是他性格中所蕴含的优秀质量，决定了他的悲惨命运。江涛黯然地对我说，陆洪恩他这个人，生活随便，爱喝酒爱抽烟爱美食，爱游山玩水，好书，好画，好音乐……。他一个心地善良、纯笃敦厚、胸无城府的人，直爽开朗，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有什么就说什么。加之他诙谐幽默，才思敏捷，常常计上心来，便脱口而出，不懂得韬略和避讳。岂知，这样的性格在那样的年代，便注定地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江涛清晰地记得陆洪恩一首后来酿成大祸的打油诗。那是五十年代初，陆洪恩和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和指挥、也是他的好朋友黄贻钧一同参加电影《武训传》的配音工作。当时以黄为主，结果1951年全国批判《武训传》，黄也遭殃。为此，陆感到十分懊恼和不平，写了一首用上海话念起来“很好玩”的打油诗送给黄贻钧：

弟本姓武，小名曰训。已一百年，骨肉无存。
忽有导演，动我脑筋，搞七念三，拍成电影。
还有寿头，是黄贻钧，叽哩咕噜，替我配音。
弄到结果，大出毛病——
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轰动，骂我山门，
我在阴曹，也受批判，活鬼闯祸，带累死人。
下次创作，千万小心——
文艺方向，为工农兵，如再弄错，勿讲情面，
罚入地狱，九十八层，当牛做马，永不超生。

1957年反右整风之后，中国大陆越来越深地陷入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泥坑，全国政治形势越来越险恶。陆洪恩对此竟然浑然无知。他竟然不理睬共产党最忌讳最仇恨对它的“领导一切”而且“外行领导内行”的铁定方针表示不敬甚或抗拒，竟然在大会小会上公开主张“指挥负责制”，提出：“乐团每天五小时业务活动时间全部由指挥来支配安排，实行指挥负责制！”还说：“给我人权和财权，我一定能搞好交响乐团。”这不是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吗？！共产党要求每一个人都作“螺丝钉”作“驯服工具”，而陆洪恩却号召：“演奏员要忠实于乐谱的每一个音符”，“要为争取在十年后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会而努力奋斗。”这又是典型的煽动走“白专道路”的罪行。更有甚者，陆洪恩还胆大包天挑战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权威来了。毛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二十年之后，在1962年（当时中国大陆因为大饥荒政治上曾有短暂的宽松），陆洪恩在乐团学习讨论毛的这篇讲话时，直率地说：

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

陆洪恩以上这些言论都是会议上的发言，都是记录在案的。在私下，他更是“肆无忌惮”地淋漓尽致地发挥这些他坚信不疑的观点。例如，他在给江涛的一些谈音乐的信件中也是这样主张的。陆洪恩的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加罪为“刻骨仇恨工农兵”，“疯狂排斥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始终不懂得用假话来保护自己，始终是有说什么就说什么，当然就会大祸临头了。江涛伤心地对我回忆说。

五

陆洪恩一步步走向“深渊”，结果发生一桩骇人听闻的“陆洪恩反革命事件”。

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姚文元先后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评“三家村”》等文章，气势汹汹。显然，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可是缺乏政治嗅觉的陆洪恩，也像很多善良的中国人一样，却把姚文只看作个人的“一己之见”，一点也没有觉察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他在上海交响乐团小组学习讨论会上说，既然党号召大家讨论海瑞，他就要发言。关于海瑞，历史上确有其人，他被罢官时有几十万老百姓去送他，人民欢迎他，因为他对人民有利。无产阶级总不能否定历史吧？！

把海瑞这个清官以及岳飞、文天祥这些民族英雄都否定了，还有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呢？！

在次日的小组会上，他觉得意犹未尽，继续说，《评“三家村”》的文章是姚文元开的火，党中央并没有下结论；难道姚文元说邓拓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家就得肯定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初邓拓的文章也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难道毛主席、党中央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到现在才来反对才来批判？到底是毒草还是什么？不能乱扣帽子！

致命的那天是1966年5月28日。

那天，陆洪恩依然早早走出家门。正在学校里念初中三年级的十六岁独子走到他跟前，低声说：“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发言，你不要讲话了……”

儿子听母亲说，爸爸在前几天学习讨论时由于讲了些不该讲的真话而遭到批判，当夜单位的好友就到家里来让母亲劝父亲忍一忍，不要讲真话。

陆洪恩轻轻地摸着儿子的头说：“放心吧，爸爸明白。”

那是个阴沉的早晨。妻儿目送他一步一回头地去上班，可谁也没想到，陆洪恩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这天在学习批判会上，单位的一些卑鄙小人以及外面不知哪里来的一些陌生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陆洪恩的人格，并大肆栽赃诬陷他讲反动言论，逼他表态“与修正主义决裂”。脾气耿直的陆洪恩不知怎么搞的竟然忘记了出门时对妻儿的承诺。他再一次控制不住自己。他又发言了，说不同意“除了样板戏，建国以来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修正主义毒草”这一谬论，还说自己看不出邓拓的文章有什么错误。在遭到殴打与凌辱情况下，他忍无可忍，大声反驳：“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如果摆事实讲道理，我认为邓拓讲对了。”

接着，陆洪恩毅然决然地当众宣布说：“你们说我修正主义，我就修正主义！”并冲动地喊起来：“修正主义万岁！”这一声口号，在当时视为绝对“反动”透顶，一声喊出，简直有如晴天霹雳，石破天惊，在场的所有人都震呆了。整个会场一片寂静……。突然，有人回神之后大喊一声：“陆洪恩……反革命！”接着又有人喊“对！反革命！”于是那些革命派七手八脚，一拥而上，立刻把陆洪恩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扭送到公安局，接着公安把他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

六

陆洪恩被关在监狱后情况如何？他是怎样悲壮地走上黄泉路的？江涛女士热切地向我介绍住在中国上海的刘文忠先生，说一定要认识他，他对陆洪恩最后的生命岁月特别是陆洪恩如何惨遭处决知之甚详。

刘文忠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文革开始不久，只有十九岁而且腿有残疾的他便被关押，结果蹲狱十三年。这位汉子，满腔热血，不屈不挠，这些年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不少文章。不准发表不准出版吗？就想办法在海外出版。他在澳门自费出版了三部书：《风雨人生路》（2004年11月）、《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2007年11月）和《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2008年10月）。他给我寄来有关资料，希望我让其广为传播。可以感觉到，他此生余年的人生目的非常明确。

刘文忠原来是陆洪恩的难友，而且刚好是监犯编号为1 1 4 4的陆先生的“邻座”，在狱中日夜相处的近两年时间，一直特别关心他的不幸遭遇。

1967年至1968年间，处于文革高潮中的上海文艺系统批斗成风，许多单位的各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纷纷到上海第一看守所来争夺一些被关押但有名望的人，把他们拉出去戴高帽子批斗。名为批斗，实为“显耀”——显示本派的“实力”。可怜的陆洪恩，几乎每月都要被拉出去批斗。有一次，陆洪恩被拉到上海小剧场批斗。那天来了文艺界许多单位，有交响乐团、京剧院、沪剧院等等，上千人的造反派大军济济一堂，逼令他老实交代攻击“文革旗手”江青亲自指导创作的革命样板戏的罪行。谁知陆洪恩却理直气壮地反问：“样板戏有什么好？中华文化艺术星光灿烂，音乐、戏曲的优秀作品比比皆是，为什么只许演唱这几个戏，而要毁灭传统呢？”又说，“外国世界一流的音乐、戏剧多的是……”还未等他说完，红卫兵冲上批斗台，对他又是拳打脚踢一顿毒打。他们像疯狗一样狂叫：“他满嘴放毒，打他臭嘴！”结果竟撕裂了陆洪恩的嘴唇！他回到牢房时，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连晚饭都无法吞咽，看了叫人心酸。

一天，开饭时刻，看守突然打开牢门进来，叫伙司（监狱中给犯人送饭的轻囚犯）把陆洪恩的饭菜倒在地上，喝令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样舔着吃。可怜的陆先生，这位有社会声望的音乐家，怎经得住这般凌辱人身尊严的胡作非为，何况他双手被反铐着，连低头弯腰也艰难万分。他再也忍受不住了，怒火万丈，当着看守的面破口大骂：“巫婆！什么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的命！大革人的命！”他称江青是一个“巫婆”，是中国人民中国文艺界的“大灾星”。看守听着不由惊呆了，随即把他横拖竖拉出去，又是一顿暴打。

刘文忠眼见他奄奄一息委实不想活了，悄悄劝阻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最好以沉默对抗批斗会，以免遭皮肉之苦，为了儿子，要活下去。可陆洪恩对这些劝告总是苦笑着摇摇头。他固执地说：“我还是要讲，有一口气在就要讲，什么样板戏？破烂女人搞的破烂货！”他甚至说：“在巫婆搞的这场‘大革命’中，我陆洪恩宁做‘反革命’！”他要讲要闹，就像吐出一肚子恶气，吐完便好像忘记了浑身被打的伤痛，忘记了被反铐着的双手，嘴里轻轻地哼着，手指微微地颤抖打着拍子，完全沉浸在他自个哼唱的美妙乐曲之中。

陆洪恩是个天主教徒，在监房里还经常祷告。自然，他的宗教信仰也成了他的一项大罪。那些革命群众当众羞辱他，进而要他当众羞辱天主教，羞辱上帝。他当然誓死不从，这又引来一场场狠毒施暴。但这位挨了暴打的音乐家却说“小将们是被愚弄的”，并不记恨在心。他常说一句话：“我跟主走苦路，是他给我的恩宠；我为义而受迫害是有福的。”

陆洪恩全然不顾自己正一步步地走向绝境，反而担心师兄贺绿汀的命运。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音乐学院批斗后回来，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但却忘了自己伤痛，只顾慷慨激昂地告诉刘文忠等难友，他是贺绿汀院长的“陪斗”。陆洪恩一向尊重贺绿汀，虽是师兄弟关系，却又拜贺为师，自认弟子。在批斗大会上，他被责令揭发贺绿汀的“罪行”，不料他反为贺表功。他告诉同监难友，贺家几次被抄，抢劫一空，贺本人也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凌辱与暴虐。红卫兵不仅常对他毒打，甚至把浆糊桶套在他头上，还逼他在地上爬。陆洪恩愤慨万分地说，贺绿汀是中国音乐界泰斗，一曲《游击队之歌》，鼓舞了全国民众奋起抗日杀敌。他创作了那么多名曲，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可是现今却遭受如此的对待，这都是那位“文革旗手”作的孽！

陆洪恩在监狱中经常向大家讲解“文艺复兴”给欧洲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与进步。他详细介绍世界音乐流派的过去与现在，介绍古典音乐、文艺复兴音乐、维也纳乐派、印象主义……他纵谈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莫扎特、施特劳斯、巴赫……这些世界音乐大师的故事。刘文忠说，听了他的讲解，更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文革中摧毁所谓“封资修”的暴行那样气愤那样反抗，他为什么那样鄙视所谓的“革命样板戏”。他决不在百般暴虐凌辱下屈服、苟全，而

又由于这样，他被认为极其顽固反动，被狠斗毒打。

由于他被揪斗频繁，却又每次耿直抗争，次次遭遇毒手，旧伤未好，新伤又添，每次回来，总是拖着沉重的脚步，遍体鳞伤，血痕斑斑。冷酷无情的看守还要时时把他旧伤未好、新伤淌血的双手扭到背后反铐起来。批斗、毒打、反铐，内外摧残，这样几个月折磨下来，浑身没有一处不是伤，身体一天比一天垮下去。本来纤弱的他，五十岁不到头发却已全白并开始脱落，枯黄瘦窄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无数次的长时期弯腰九十度使他背驼得更厉害，两个耳朵被打得流脓，眼睛混浊，看上去比一个七十岁老翁还要衰老。

不过，陆洪恩还是有股力量支撑自己气息奄奄的残躯。他有宗教信仰，而且，他太热爱音乐了，他敬仰贝多芬，视音乐为生命。无力动弹的他，每天还常翕动嘴角，轻轻哼着《英雄交响曲》和《庄严弥撒》。他是在借用人类音乐精华的顽强力量。他说《英雄交响曲》最能代表大师不屈不挠向黑暗挑战的斗争精神；他称《庄严弥撒》是“圣咏”，并表示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一定会哼着这首曲子迎接死亡……

七

一个深夜，陆洪恩悄悄地告诉刘文忠他的家庭住址，说他有一个儿子，妻子是上海舞蹈学院的一位钢琴老师。他泣不成声地说：“小兄弟，蒙受你照顾我已几个月，很感谢你。你有机会出去，我托你两件事，第一，帮我找到被‘扫地出门’而去了新疆的独子，转告他父亲是怎样死在监狱中的！第二，将来你如还有机会逃出中国，帮我走访我一生向往的音乐之乡，在维也纳贝多芬的陵墓前帮我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他的崇拜者是哼着《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从话里的内容和口气，刘文忠知道他已下定决心以死抗争到底。

不久，难友发觉，陆洪恩的脑子不是被打坏就是受刺激太深而疯了。他开始发高烧，讲胡话，日日夜夜在说“巫婆来了”“巫婆来抓人了”，又不断地自言自语“毛……毛……毛毛……”他发了疯似的见到一切有毛的和红色的织物都要咬，毛巾、毛衣、毛裤……。渐渐地，他精神意识开始失控了。大家也无法阻止他，心里都为他捏把汗，惊恐异常地眼睁睁看着他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那天，训导员把他们监房里关的十四个犯人全叫到训导室。办公桌后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审讯员，一个是训导员，另一个据说是上面派下来的。训导员首先开腔，训斥陆洪恩在外面批斗会上呼喊反动口号，在牢房里犯扩散反动言论罪，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审讯员勃然凶狠地问：“1 1 4 4，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一个态！”

陆洪恩仅仅沉默了一下，便像濒临死亡前回光返照般，骤然精神抖擞，热血沸腾，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开口“表态”。有如冲天长啸，他开口便决绝地明言：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

他演说一般地从世界文明发展及其分化谈起：……自从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妍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搞内耗，造

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专制、愚昧、个人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家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知识，拿知识分子当宝；我们砸烂文物，侵犯人权，打、砸、抢、抓、抄，批斗毒打教师，视知识越多越反动，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当“牛鬼蛇神”；人家求安定、讲团结，重视伦理道德；我们惟恐天下不乱，争权夺利，批判孔孟忠孝节义，搞阶级成分论，煽动仇恨。

他激昂义愤地直言抨击道：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所有的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命链。知识分子命运多惨，苦不堪言。堂堂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而且没有作者，都是文革旗手一手遮天，这只能证明我们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沦丧。

……我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着党走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斗倒批臭大批爱国的人民教师、学者、工程师、艺术家？他们在辛勤耕耘，传播文化知识，他们已经把一切个人功劳与荣誉都上缴给组织、给党，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他还要屈辱我们，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我们听毛主席话跟着党走，可是他建国以来，从53年围剿胡适、55年反胡风、57年设阳谋反右、66年又开展文革焚书坑儒，都是要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忠贞竭力、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现在广大知识分子生不如死，一个民族发展到死比活还安定，这个民族无疑已经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要我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陆洪恩话音刚落，刘文忠不由自主地抬头看看墙上挂钟：足足演讲了十五分钟！

陆洪恩口若悬河，痛快淋漓，慷慨陈词，直抒胸怀，发表了这样一篇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战斗檄文。在场所有难友屏着呼吸，心灵上早被陆老师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凛然大义所震撼。刘文忠觉得，似乎坐在他们身边的不是音乐家，却像是“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又一个碧血丹心的“殉道者”！

真是一个特异的场面！起码在这所监狱所有审讯中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一直吃惊不语的三个审讯人员相互对视一眼，才回过神来。他们三人纷纷大拍桌子，破口大骂：“1144你死到临头了！我们都记录在案。你要为刚才所恶毒散布的反革命言论付出代价。本想给你一次机会，既然你不怕死，政府成全你！”训导员挑了三四个年老的犯人，要他们作为证人签字。他们被迫用发抖的手签下了这份要天主教徒陆洪恩命的、似“最后晚餐”的“账单”。

各人被赶回牢房时，陆洪恩还坐在地上，似乎一吐为快的恶气吐完了，像一尊雕像那般平静地一动也不动。

难友们为陆老师深深叹息：“完了，1144死定了！”大家既惊讶又敬佩他有这么大勇气面对死亡。其实每个人心里明白，陆老师刚才发出的一篇战斗檄文正是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三十分钟后，牢门再次打开，看守凶狠地推进了陆老师，双手反铐着的他，又上了脚铐，几乎是滚进来的。只见他脸面全是血，这顿毒打几乎夺了他的命。大家的眼泪都夺眶而出。看守训斥大家：“谁也不准帮他，否则严惩！”看守出去把牢门关上后，刘文忠顾不得警告，上前把他

扶起来，用水擦洗他满脸的血迹。他嘴里鼻孔里都淌血，眼角也流血，双眼血肉模糊。这天大家心情沉重，敢怒而不敢言。同监的盲人修士颤抖地在作祷告，喃喃不断地低声说“罪孽啊！罪孽！”晚上刘文忠躺在陆洪恩身边一夜未合眼，又偷偷帮他反铐转正铐，不断帮他按摩手、肩、腰背和小腿。

一个星期后，一天深夜十二点钟，难友们被看守“嘭嘭”敲门声惊醒，只听叫喊：“1 1 4 4 出来！”看守指着刘文忠说：“你帮他东西全部整理好，拿出来。”刘文忠一边帮陆洪恩整理，一边含泪向他告别，并悄悄告诉他托的口信一定带出去。大家看到陆老师镇静自若，带着手铐脚镣嘴里依旧哼着《庄严弥撒》，一阵悲壮之情涌上心头。半夜三更这样被匆忙带走，凭老犯人的观察经验，十有八九将走上不归路。

这一夜特别漫长。刘文忠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望着旁边的空铺位，想起了一幕幕场景：他那沉醉音乐、低哼乐曲的百般留恋的神态；他每次批斗回来的惨相；他在训导室英勇无畏激昂陈词的神态；现今他丹心碧血，血祭文革。刘文忠心里悲愤地喊道：苍天啊！为什么如此狠心如此不公？！文革，文革，又革掉了一位想报效祖国而不能的音乐家的命！

四天后，长时间读不到报纸的难友们，见门上小框洞里丢进一张《解放日报》。看守隔门叫喊：“好好读读1 1 4 4的下场！”刘文忠赶忙捡起一看，第一版上醒目地刊登“严厉镇压十名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的消息。七名犯人被处决，其中就有“反动学术权威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这是大家预料之中要发生的事。难友们一言不发，听刘文忠一口气读完了这段新闻报道。七座的师范大学教授咬耳对刘说：在希特勒时代，法西斯规定，德国公民凡侮辱元首者拘捕两星期。可文革中对领袖远未达到“侮辱”的程度，就可以被枪毙，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盲人金修士则在痛苦地不断默诵圣经，为这位信奉天主教的音乐家兄弟超度亡灵。

有文记载曰：1968年4月27日，陆洪恩突然被押到了当时的“上海革命文化广场”。电视镜头将一位五花大绑、头发花白、身体佝偻、步履蹒跚、俨如古稀老头的人物推到了人们的面前，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那位风度翩翩、在谱架前动作潇洒、乐思敏捷、还不满五十岁的陆洪恩老师吗？……

就是在这个一无检察院、二无法官、三无辩护律师的“万人公判大会”上，陆洪恩被判处死刑，“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罪证”是“扩散反革命言论”。就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指挥家，在狱中被折磨了两年后又当权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了——陆洪恩成了文革期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被公开杀害的第一人。

八

那么，刘文忠又是如何也被关到监狱，成为陆洪恩最后生命岁月的见证人？这又要从刘文忠的哥哥刘文辉说起。

（下略，关于刘文辉案，请参看本刊所载刘文忠撰：“纪念反“文革”第一人——刘文辉”和“风雨人生路”，z k 0 5 0 5 d — z k 0 5 1 1 f ——编者）

十二

刘文辉和陆洪恩等人以死对抗的十年文革这个浩劫究竟有多恐怖？不计无形的多少代也无法复补的民族摧残，只以有数字可算的：全国遭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两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这是中共元老叶剑英在1978年12月

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的“不完全统计”。关于冤枉死亡者的遭遇，恐怕永远都无法全部厘清了。一些主要的被杀害的烈士的粗略数据，可以从例如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等书报杂志上找到；刘文忠也给我看了一份他整理的名单。根据我手头的资料，除了本文所叙述的刘文辉和陆洪恩之外，比较著名的血祭文革者还可以列出很多，例如：

林昭，女，1960年10月被捕，1968年4月29日被处决，是年不到三十六岁。罪名是：1957年划为右派，此后死不改悔。批判共产风，为彭德怀鸣冤，建议学习南斯拉夫经验。1959年参与X物《星火》反革命集团。1965年判刑二十年。在狱中用竹签、发卡、牙刷柄等书写血书，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写诗文二十余万字，重点批判“阶级斗争”学说和集权统治，呼吁人权、民主、和平、正义。1980年12月30日平反。

王佩英，女，1968年10月被捕，1970年1月27日被害，是年五十四岁。罪名是：自1964年至1968年10月，书写并散发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1964年夏，公然提出：毛泽东应退出中央领导层。同时提出退党。文革中进一步撰文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已走向历史反面，应退出历史舞台。她在酷刑毒打与迫害之下，始终坚持信仰，多次公开表明自己理念。判处极刑后，因反抗被勒死于刑车。1980年5月8日平反。

吴晓飞，1968年5月7日被捕，1970年2月27日被处决，是年仅二十一岁多。罪名是：于1967年11月至1968年4月，写了两篇各长达二十余万字的政论，认为江青是“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发动武斗的祸首”；说批判刘少奇乃是“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的迫害”；认为文革“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指出林彪“有阴谋”，把毛泽东思想“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1980年6月平反。

遇罗克，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被处决，是年二十七岁。罪名是：在他于1966年2月寄给上海《文汇报》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发表时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一文中，点名批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针对文革中风行一时的血统论，他在1966年9月写出著名的《出身论》予以严词批判——人们把遇罗克的《出身论》称作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发出的中国第一部《人权宣言》。1979年11月21日平反。

张坤豪，1970年2月被捕，1970年3月19日被杀害，是年二十八岁。罪名是：反对批判刘少奇和其它老革命家。1969年7月6日被勒令检查交代时，却签名写下“我热爱刘少奇主席”，随即隔离审查，批斗毒打，群众专政八个月。其间写有九份“反动”材料。他认为，中国“被个人迷信充塞着”。1979年10月平反。

方运孚，1970年2月被捕，1970年3月6日被害。罪名是：撰联讽刺文革派：“打击一大片，尧舜禹汤皆右倾；保护一小撮，桀纣幽厉最革命”；攻击说“林彪、江青野心很大，整掉大批老干部就是为了他们自己上台”；又为刘少奇、彭德怀鸣不平。1968年“一打三反”中，重庆公安局办案人员起初拟将被收捕的方运孚判十五年，报到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二十年，送重庆市革委会审批，改成无期，四川省革委会终审时，进而改成死刑。本来犯人有十天上诉期，可是十天还没到，方运孚就被拉去枪杀了。1980年平反。

毛应星，女，1969年1月23日被捕，1970年4月14日被害，是年四十五岁。罪名是：狱中书写“反动”笔记，说：“这样的政策最有利于什么人呢？就是有利于一些个人野心家、资产阶级政客，倒霉就是老百姓，而毛主席的江山最后也被这些人所葬送。”“顶峰论是采取资产阶级哗众取宠、奴颜卑膝地宣传捧场，欺骗人民。”又说大搞“忠字化”“分明是唯心

论”。毛应星被五花大绑押往刑场时，身材瘦小十分衰弱的她，却镇定自若，目光明亮，从容不迫。1980年11月29日平反。

陈卓然，1970年2月被捕，1970年4月28日被害，是年只二十岁。罪名是：1970年，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组成“反动标语”六十多条，贴到南京市主要街道上。这就是轰动南京的“2.12反革命案”。1980年平反。

丁祖晓，女，1969年7月5日深夜被捕，1970年5月8日被害。罪名是：1969年3、4月间，寄信和发传单，反对“三忠于四无限”宗教式狂热。她认为：“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不应该忠于哪一个人。现在提倡的‘忠’，是搞个人崇拜，是搞奴隶主义。”“这恰如封建社会里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姐姐丁祖霞也支持、参与她的活动。她们呼吁民众“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此事被认为是“穷凶极恶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而列为当地“特一号案件”。临刑前丁祖晓还慷慨陈词，批判个人崇拜、奴隶主义。

李启顺，女，1969年7月被捕，1970年5月8日被害，是年二十四岁。罪名是：刻印二十多份《告革命人民书》，为同学丁祖晓叫好，称她为“当之无愧的革命先锋”，猛烈抨击林彪、江青大搞现代迷信。她十七岁的妹妹李启才也自告奋勇，深夜到县城各主要街道去散发。传单还直接寄给“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为此，她们四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全部被捕入狱。李启顺与丁祖晓同一天被枪毙，丁祖霞则被判刑二十年；李启才判刑十年。1980年8月，她们获得了平反。

忻元华，1967年1月25日被捕，1970年5月30日被害，是年三十七岁。罪名是：1967年1月，致信毛泽东，称：文革是“党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惨祸”，“祖国的上空笼罩着个人崇拜的阴云”，恳求“您老人家赶快醒悟”，“赶快采取最有效的自我批评的紧急行动”，“解决当前万分严重的局势”。随即以“恶攻罪”被捕。1979年12月平反。

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分别于1970年3月、1970年8月、1969年1月被杀害。罪名是：成立“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共十三名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将心得编为《学刊》油印小报。批判中共“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坠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还批判说，“现在的形势类似辛亥革命的形势，也有个窃国大盗袁世凯，企图利用文革篡权，此人就是林彪。”1978年8月平反。

官明华，女，1967年1月被捕，1971年3月12日被判处死刑，惨遭杀害，是年三十七岁。罪名是：认为林彪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是“野心家、阴谋家”和“披着羊皮的狼”，高呼：“林彪的末日快到了”，“打倒林彪，把林彪拉下马”，被定为现行反革命。1978年秋平反。

王笃良，1968年6月被捕，1971年8月6日被害。罪名是：认为“刘、邓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马列主义者，是国家的栋梁，把他们打倒，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害无益”；有人“光抓权力，不抓生产，结果使国家政权和人民生活失调”。在狱中又写道：“林彪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忠、忠、忠，他心里有鬼。”又针对刘少奇被诬陷一事说：“什么叛徒、内奸、工贼，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被诬为“顽固不化的现行反革命”。1980年6月平反。

张志新，女，1969年9月24日被捕，1975年4月4日被处决，是年四十五岁。罪名是：一次次批斗会上责问：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什么“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她对林

彪宣扬的“顶峰论”非常反感，认为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不好。她又认为派性泛滥、武斗成灾是江青在搞名堂；江青不是“文艺旗手”，而是破坏祖国文化艺术的罪魁祸首。特别是，她指明毛泽东是文革灾难的“总头子”。行刑前，张志新被惨无人道地割断喉管，以防喊“反动”口号。1979年3月平反。

史云峰，1974年12月24日被捕，1976年12月17日判死刑，两日后枪决，是年二十七岁。罪名是：1974年10月26日，史云峰散发标语、传单，反对“四人帮”，为刘少奇等人受迫害鸣不平，指出刘少奇一案是“千古奇冤”；提出：“全面审查文革中的错误”，“沿中共‘八大’路线前进”，给刘少奇等人“恢复名誉”。临刑前，史云峰嘴塞纱布用缝合线紧紧勒住，以防喊“反动”口号。1980年3月平反。

张锡琨，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1976年底或1977初被枪毙。罪名是：在1957年鸣放整风时贴出《卫道者逻辑大纲》大字报，被打成右派送北京团河农场劳动教养；1969年被遣送到四川继续劳教；最后被以“企图组织逃跑”的罪名判处死刑，至今未平反。张锡琨为之送命的1957年大字报如下：

- 1，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
- 2，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
- 3，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
- 4，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诽谤造谣；
- 5，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
- 6，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
- 7，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
- 8，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 9，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
- 10，“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若过敏就是别有用心。

王申西，1968年1月因卷入“炮打张春桥”及对文革不满被隔离审查，抄家，1977年4月27日被处决，是年三十一岁。他的“现行反革命”罪证全都出自他的日记、读书笔记、读毛选眉批和给女友的书信里。早在1964年，他就开始批判思想独裁。他写道：“完全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的脑袋。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在六万万人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陆地上以一个同类生物的思想作为神圣的意志来主宰一切。这一成功实在是难以想象的。”此后，他不断批判“三面红旗”、“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极左思想”；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提出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1981年7月平反。

李九莲，女，1969年5月15日被捕，1977年12月24日被处决，是年三十一岁。最初因怀疑文革、怀疑林彪、为刘少奇鸣冤被捕，判刑五年。林彪倒台后，她虽获得释放，但还是定为“现行反革命性质”。1974年3月，李九莲忍无可忍，在公园贴出了《反林彪无罪》等六份大字报，因此又于1974年4月19日深夜被秘密逮捕，并于1975年5月被判刑十五年。1976年12月，李九莲在狱中写下了《我的政治态度》，后还当众念出，犯了“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死罪。李九莲被枪决后，尸体在荒野暴弃数日，并惨遭侮辱，乳房和阴部被割了下来。1980年，在胡耀邦支持下平反。

钟海源，女，1974年4月被捕，1978年4月30日被处决，是年三十岁。最初罪名是因声援李九莲，在家里起草了《最最紧急呼吁》等传单，自己刻，自己印，自己散发。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她在监狱里公开说“华国锋不如邓小平”，被判处十二年有

期徒刑。李九莲被杀四个月，钟海源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她听完死刑判决后，毫不犹豫地签了名，然后把笔一甩，昂首离去。行刑时枪击未死之前活剖取肾。1980年在胡耀邦支持下平反。

.....

十三

这些惨遭处决的文革义士，越去追查便会发现越多，简直多不胜数，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悲痛欲绝！这些华夏英烈，为了思想毅然决然面对红色恐怖面对残酷死亡，成了沉沦神州的血祭者。他们值得华夏子孙永久铭记。其中，刘文辉又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他，在已知的文革被害英烈中，是最早公开批驳《十六条》这个毛泽东指导文革的纲领。在1966年，还没有一个人这么早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站在世界发展的大视角上，敢于把毛泽东放在批判声讨的对立面，一针见血地剖析文革的反动性，预见它将给中华民族带来旷古未有的深重灾难：

他，最早警告中国民众“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和全民大迫害运动”，并号召全党全军起来抵制文革。无论对文革的性质分析，还是反抗烈度，刘文辉都是走在最前面的第一人；

他，1966年11月底被捕，1967年3月23日遇难，是文革政治犯中最早的被处决者，甚至比林昭烈士还早一年多。

他，即使在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均获平反的时候，独独不获平反。后经亲属反复上诉，一直拖到1982年，才宣布无罪平反。最初法院驳回的“理据”是：“刘文辉是真正的反革命，不仅反文革，而且反对毛主席，反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这个“理据”是不值一驳的。一个真正的反文革英烈，必定反毛也必须反毛。因为文革乃毛一手发动，反文革不反毛，看不清识不破这一点，认识层次就不可能太高。刘文辉最早遇害最晚平反，可证明其“反”之深之烈。死刑判决书、遗书俱在，可证可鉴。

的确，从目前见到的材料看，无论从时间、性质、内容，或反抗程度上，刘文辉是中国第一个公开反文革反毛泽东的义勇之士，也是血祭文革第一人。

一位文革研究者说，在大雾弥夜的文革初期，一个学历仅初二而只靠自学成才的青年，能够众醉独醒，公开反毛，血荐轩辕，且自成体系，令他拍案惊奇，钦佩之至！我所熟识的上海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在得知刘文辉事迹后，也产生了同样的惊疑：其叛逆思想从何而生？提供深入思考的思想资源从何获得？虽然毛泽东的“反右阳谋”使他睁开迷眼，“反右幸尝智慧果”，开始反思各种时政，但从宏观上检视毛权威与史无前例的文革，对那一整代青年来说，实属几无可能的历史局限！

刘文忠的这位辉哥，领先时代至少三十年！许多文革研究者都有此共识。

然而，让人非常遗憾的是，刘文辉至今尚在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视野之外。我虽然很早就知道“刘文辉”这个名字，但如果没有看到刘文忠给我的资料，便不可能达到今天的认识。这又是一个我在《北望长天》一书中绝对不应该遗漏的人。对着他先知先觉、大义凛然的光辉形象，我惭愧万分！

十四

在这篇称之为报告文学的拙文最后定稿之际，我将再次到中国重庆考察。时间真是过得飞快，这次造访，与我于2004年9月的上次，竟已经相隔七年了。

我上次到重庆，也去了一个特殊的墓园凭吊。这是一个红卫兵墓园，在重庆市沙坪公园西南角，石墙围着，曾长久与世隔绝。

四十多年前的文革期间，山城重庆“武斗”惨烈，规模为整个中国同期之最。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见于官方记载的就有三十一一次，其中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现代军械兵器进行的，计二十四次。武斗中死亡者的尸体当时就分散掩埋于重庆市区约二十四处地方，沙坪公园内的墓园是其中主要的一处，于1967年6月到1969年1月期间造墓立碑。根据沙坪公园管理处的数据，墓园里有一百一十三座墓碑，共掩埋有五百三十一人，其中四百零四人死于文革中的武斗，他们只是当时重庆武斗死亡人员的一小部分，大都是在1967年5月至8月间被打死的中学红卫兵和重庆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工人造反派。研究者根据碑文资料还考证出，墓园中的死者，工人约占到百分之五十八点九，学生约百分之四十；年龄最小的十四岁，最大的六十岁，其中二十六岁以上者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五。

公墓座落于一片小树林里，西高东低，依山傍水，占地约三千平方米。正门右侧石墙外，红漆写着四个大字：“文革墓群”。有一条中央小道勉强做中轴，通往深处，左右两侧的墓碑皆疏密无序，布局杂乱。据知情人回忆，最初就是乱埋，各个单位就近找地方，先来先埋，先左后右，逐步往后移。大多是合葬墓，最大的墓埋了三十七人，分三层掩埋，层与层之间用预制板分隔。坟墓碑型各异，有的碑顶嵌有派别名号的火炬。有几个墓碑，高出了石墙。墓碑上当然刻有死者姓名、简短生平、什么时候在哪里“牺牲”等，但让人最为感触甚至触目惊心的是，为了突现死者的“英雄气概永不灭”，墓碑上都刻有当时流行的最红最革命而现在简直不可思议的豪言壮语，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等等。当时坟墓都用质量很好的建筑材料筑面，但如今大多风化，有的上面的文字都已剥落或模糊。虽然近来有死者亲属用人造大理石重新整修了一些墓地，但整个墓园，是一片凋零、幽深、凄凉景象，让人不寒而栗……

那天，我坐在墓地路旁一块石头上，良久不动，堕入深深的沉思中。当年参与者见证者的各种旧闻，包括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各种景象，一一在脑海中反复重现。现在写到这里，我且借引在网上看到的一段足可重现当年重庆武斗的可怕景象的回忆：

……1967年8月1日清晨，全副武装的“反到底”派向建设厂和建设工业学校修筑的工事发起进攻，四联装高射机枪和舰用机枪数十台，一齐向“八一五”派的大楼开火，并用炸药炸开楼房工事。红色大楼顿时火光冲天，喊杀声不绝于耳。附近同派的重庆机械制造学校的“机校兵团”也参与了防守。

双方战斗极为惨烈，枪炮声整夜不停，震耳欲聋。

8月3日清晨，“八一五”派全线溃退，带走尸体十数人，在“反到底”派追击中，有些来不及带走的就丢下随着就腐烂在水田里……

8月5日，大都是重庆大学组织来的“八一五”派学生，为了争夺建设厂夺取武器，不惜

一切代价向建设厂清水池制高点发起攻击。“反到底”派人抬肩扛，将两台14.5毫米的4条枪管的重武器推到半山腰上，猛烈轰击大批手持各种火枪武器冲锋围攻上来的“八一五”派，一时死伤者漫山遍野。

重庆八月的大热天，尸体很快高度腐烂，白骨森森，惨不忍睹。此一役，“八一五”派丧生一百五十人之多，这些人大部分没有被安葬在公墓里，有的人至今无人知晓姓名……

什么“八一五”，什么“反到底”，还有其它什么什么派，当年都各自视为多么神圣多么伟大的名号啊！但如今，却连一点点的价值都没有。也许，他们的死亡也有一点意义：他们也是文革的血祭者，是可悲可叹的另类血祭者；他们的死亡指向一种令人震惊令人发指的荒诞：势不两立的派别，竟然是为了他们同一个所谓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而互相残忍地斗杀！上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场，只是在重庆一个地方。当年，在整个神州大地，在许多城镇，一旦武斗起来，其气氛极为恐怖：武斗者拿着武器横冲直撞，高低楼房碉堡工事林立，大街上战车呼啸而过，大桥、机关要地架着轻重机枪……红了眼、丧失了人性的杀人者互相对准的是同学、同事、工友、邻居，是同胞甚至是自己的亲人。所有杀人者和被杀者都认定自己在捍卫无限神圣的所谓“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因此上刀山下火海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当时中国全国人口八亿，几乎全部八亿之多的民众居然就这样被愚弄被牺牲！人世间最可悲也最不可理喻的事莫过如此！

十五

如今我要再次造访的重庆，更让世人惊奇的是，它又是已在神州大地广泛开展的“唱红”运动的发源地。

所谓“唱红”运动，其主要内容就是唱“红歌”。我问刘文忠先生，今天中国各地最流行的是哪些“红歌”？他给我举了一些，包括：《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唱支山歌给党听》、《我爱北京天安门》、《党啊，亲爱的妈妈》、《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红旗飘飘》、《延安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爱祖国的蓝天》、《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这些“红歌”，有一些是近年来创作的“主旋律”，而大多数是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文革时代最为流行的革命歌曲。刘先生说，当年他在监狱与劳改农场，大多是在集体政治训教和公判、加刑大会这些场合上被迫收听这些“红歌”，当然非常反感，但服刑者不能有丝毫不乐意言行，否则会严加惩罚……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是最红的“红歌”了，还曾经一度事实上取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来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位置。当年，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大办“人民公社”，盲目“大跃进”，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反“右派”，掀起文化大革命，一个个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使无数人无辜被害，冤假错案遍布神州；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淫威之下，万马齐喑，国家命运濒临绝境……“红歌”反映的是一个时代，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这个时代，从国内战争年代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它所宣扬的文化都是“极左”，从吹捧、神化领袖到宣扬仇恨、斗争，不一而足。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说，这样一些“红歌”就是浸透着专制毒汁的“恶之花”。

现在，不是几十年已经过去了吗？！文革结束后，不是已经批判过个人崇拜了吗？不是说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吗？文革后在“拨乱反正”中这些问题不是都已解决了吗？把毛从神坛上拉下来，当时不是已有共识、不是已深入人心了吗？看来，就像鲁迅先生多次深刻地指出过的那样，中国的最大悲剧之一，是对黑暗和错误的清除不彻底而不断反复——当时的“拨乱反正”实在太不彻底太有问题了。

三年前，中国大陆许多人最初听到重庆的唱红歌、讲革命故事、发红色短信的活动时，觉得像是一个笑料，只是一笑置之。而现在，大江南北红潮滚涌，唱红歌、跳红舞、播红剧、贴大红标语、做巨幅党旗、万名党员宣誓……等等，煞有介事，争表忠心。闹剧要变成另一幕正剧吗？文革的幽灵重又在神州大地徘徊吗？是时空错乱吗？

这些年，中国大陆在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后面，也出现一系列严重问题：官场贪腐贫富悬殊触目惊心，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也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在社会矛盾不断恶化，原来马列意识形态又已不灵的情况下，有人寄望于“唱红”办法，企盼这股浪潮能给予他们新的力量，可以安抚大众情绪，在党内能结成联盟，得以最大程度地延续其权力。但是，对整个国家来说，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来说，“唱红”运动能化解社会矛盾吗？它将会导致的恶果谁能承担？又如何承担？

……思绪驰骤间，我不禁联想到两年前在维也纳中央公墓的凭吊。那里，即使是墓地，也是那样宁静、祥和、高雅。

我还想到，七年前我在重庆红卫兵墓园的凭吊。在那里，我和冤魂相会。他们悔恨交集，拖着屈辱厌倦的脚步，纷纭杂沓，在我面前无声滑过。今天，如果再度见面，他们脸上一定还带着惊讶不解的表情——他们怎么能料想得到，墓地外面，如今“红歌会”的招牌到处悬挂，人们每天聚合，高唱所谓红色歌曲。歌声飞越时空，甚至让阴间也不得安宁。而这些“红歌”的高歌者，是否会在某场梦魇之后，突然想起，有人是唱着“红歌”去赴死的，就是四十四年前墓地里的那些死者？！

当年，沉沦神州的无数血祭者，你们以生命作为代价，难道还不足以让你们的同胞多少有点醒悟吗？！

也真难说。流光逝水，几十年过去，真是弹指一挥间！而竟然，就在这么短暂的一个历史期间里，在今天中国，大多数青年人，不要说对刘文辉、陆洪恩等等文革血祭者，对这些大义凛然、先知先觉的民族英烈，已经浑然无知了，就是对这个长达十年、史无前例的中华民族大劫难，竟然也在总体认识上非常模糊甚至混乱。这是何等可悲可叹而且可怕啊。

那么，荒诞真的需要再一次重演吗？！

真让我非常困惑……

2011年8月18日于澳洲悉尼

□ 摘自《爱思想》网站

~~~~~

【童年旧事】

文革时的“焚书”记忆



• 乔海燕 •

文革开始，我们学校贴满了大字报。不少大字报标着“北京消息”、“北京来电”，兴致勃勃传播各种消息，多数鸡零狗碎，与革命无关。但是，同学们平时看惯听惯了宣传，对这种坊间传言，反而觉得新鲜、有趣，便非常关注，又津津乐道，宁信其有。

一日上午，忽有大字报传说，唱红小说《欧阳海之歌》有问题了！主要是封面“欧阳海之歌”几个字。传消息者很快现身校园，拿著书向周围的人解释说，这几个字是郭沫若所写，字内藏有若干反动口号，把一个字左右、上下颠倒着看，再把字的笔画重新组合，便可见极其恶毒、骇人的反革命字句，多涉及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的党、战无不胜的解放军，等等。说完，该同学将一个“海”字做示范，他把书摆出各种角度，随意解释，如将偏旁三点水解释为一把利剑，剑锋指向，大家可以设想。说完，他又故作神秘说，我又发现新线索。他把书倒过来，指着封面那座欧阳海推军马的塑像，说，你们看看这个底座，这片阴影，像不像列宁同志的胡子？

同学们看得目瞪口呆，个个浑身冷汗，脸色都变了。原来阶级斗争这么尖锐、复杂啊！怪不得毛主席说，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人人都有大梦初醒、洞天开地的感觉，原来革命还可以这样搞嘛。

同学们都迫不及待回家，找来自家的“欧阳海之歌”，越看越像，又指给弟弟妹妹看，又向邻居解说，消息迅速向民间传布。到了下午，我们学校成了围剿“欧阳海之歌”的战场。教室里、校园里，到处都是手拿此书的同学们，三五成群在一起仔细查找，拼命猜想、联想、幻想。有人发明了拆字法，将五个字一个个分开，左右分，上下分，拆零分，拆开的偏旁部首、笔画，再有机组合，组成各种反动标语。各种创新工具不断出现，立即在实践中检验，新发现便源源不断，马上有专人写成大字报，随即公布。

第二天，同学们热情不减。不少同学已经扩大范围，不光找“欧阳海之歌”，还有其它一些小说，凡是封面有题字的，都在怀疑之列。而且此法很灵，只要是书写的题字，无论楷书还是行书，用“欧阳海之歌”法套用、检验，百发百中，无一幸免，统统在“反革命标语”之列。

就在同学们激情澎湃，革命烈火在校园遍地燃烧时，一个响亮的声音说，咱们学校图书室有《欧阳海之歌》！

于是，大家蜂拥挤进图书室。果然，一个书架上排列着十几本《欧阳海之歌》，有几本的封面已经破损，可见借阅人多，流毒之广。

有同学伸胳膊一扫，将十几本书尽数扫落。大家围着脚下的“欧阳海之歌”喊口号，欢呼革命胜利。突然，有人在另外的书架上看见《三家巷》、《青春之歌》、《火种》、《创业史》、《苦菜花》……还有一些苏联小说。大家惊叫，这些都是大毒草啊！这么多大毒草！

同学们兴奋起来。——这里有！这里也有！——发现毒草的喊声此起彼落。

这儿有一本黄色小说！有人举着一本书惊叫。大家不约而同伸过头去看，是莎士比亚的诗剧《维纳斯与阿童妮》，封面就是波提切利那张闻名于世的维纳斯浪花诞生图。可恨的是，维纳斯居然与所有刚出生的婴儿一模一样，还挑逗般用长发进行毫无意义的遮挡。

哎呀呀！——同学们一面传看，一面叫喊——真黄啊……真黄啊……

烧掉，把这些大毒草全部烧掉！有人提议。

好啊！大家齐声欢呼。

同学们将书架上的书搬下来，一摞一摞地扔到图书室外面，堆在一处空地上。

我也参加了这个“革命行动”，卖力气往外搬书。

图书管理员是李老师。此时，她面色蜡黄，呆呆站在门口，看着学生们兴高采烈地把书抱出去，扔在外面的地上。地上散落不少书，被践踏得不成模样。有人抱著书，脚下还“运球”般踢着一本，两只脚倒腾着。李老师看着同学们糟蹋书，不知所措，嘴唇嗫嚅，我从她身旁过，听见她喃喃自语，小心点啊……小心点啊……

革命来了，革命不是那么温良恭俭让，是天翻地覆。昨天，同学们还规规矩矩地排队借书、还书，尊敬的称管理员“李老师”；今天，他们却变成了另一种人——打老师、烧书、砸教室。学校、老师精心教育了他们几年，三好五好年年评，一夜间却荡然无存。

开始搬书时，同学们还有挑拣。图书室里不断响起“《我们播种爱情》是黄色小说吗？”“《嘉莉妹妹》是黄色小说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好像是反动小说！”等提问，便有人回答“是”，也有人回答“不是”，谁想回答就回答，没有标准，也没有规则，完全依挑书者的兴趣。多数人什么都不问，自己挑选，直接搬走扔到外面。到后来，不知谁说了句“真麻烦，干脆都烧了吧！”大家都同意。于是就不挑选了，一扫而光，统统搬走。

我抱了一摞子《红旗飘飘》丛书，有十几本，上面还有一本《志愿军一日》。这些我都看过，很喜欢，觉得不是黄书、反动书，便悄声问旁边一位同学，这几本书也烧吗？他拿起《志愿军一日》翻看，我一眼就看见那篇“向我开炮”的文章，说，这就是王成的故事，英雄儿女。他看我一眼，悄声和我商量，扔到书柜子后面吧，别人看不见。

扔在图书室外面的书越来越多，渐渐堆成一堆。不知谁点了把火，书就烧起来了。大家一片惊呼，烧起来啦！马上都愣住了。——毕竟我们是学生啊！书，是我们除了父母之外朝夕相伴的朋友！

那一刻，场面很安静。火越烧越旺，红色的火苗呼呼响，掀动书页的“唰唰”声，清晰可闻。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有人大声念毛主席语录。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有人附和着。

对！烧掉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大家热烈欢呼起来。

焚书很快就变成一场运动，全校的学生都涌到火场。几个总是出头露面的三年级学生抢进来，举着毛主席语录，忙不迭翻找与焚书有关的“最高指示”，吆喝闲人闪开，又环视四周，挺胸，收腹，很有些“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气概。他们拿着长棍子，将码在一起的书分开，便于烧透，还不断回身带领围观的同学们喊口号。

焚书的火场，正好在学校行政楼前的一棵大柳树下。柳树的万千枝条是校园景色的标志。此时，大火冲天，直上重霄九，把一树柳枝烧得风摇风摆，痛苦万分。很快，柳树也被点燃了，火舌顺着柳枝往上窜，半棵树都烧起来。

我站在火场旁，跟着大家一块看，又捡起掉落在地上的书，扔进火里。

那几个组织焚书的三年级同学，号召同学们清理图书馆，把剩余的书搬来继续烧。我进了图书馆，看见一位同学站在取书的木架子上，抱着一摞子书，正喊人帮忙。我赶忙过去，伸手时无意间瞥了一眼，却看见一本厚厚的书，书脊上有非常醒目的三个字：神秘岛。

神秘岛！我的心轻轻颤了下。我是儒勒·凡尔纳的热爱者，看过他的几本书，《地心游记》、《气球上的五星期》，三部曲只看过《海底两万里》，但已被故事深深吸引。在教室里给同学们讲尼摩船长和诺第留斯号的故事，是我最得意的时候，那一刻，教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围着我，看着我，屏息静听，我拿眼角还能注意到，有几个女生也坐在位子上悄悄听我讲。我知道三部曲还有《神秘岛》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朝思暮想。可是今天，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场合下，我看到《神秘岛》，我心仪已久的书，却是在它将要上刑场之前。

那个同学抱著书下来，叫我帮他拿一些书，说，太多了。

我看准了那一摞书，正好从《神秘岛》那里下手，接过一半，抱着往外走。

我总算拿到《神秘岛》了，虽然看不到，但我知道它就在我手下，紧贴着我的手掌。我摸着它的硬皮封面，手指头轻轻摩挲着这本我朝思暮想的书，一面向着火场走去。

出门就是焚书现场，我把书放下，开始一本一本往火里扔书。最后一本，确实是《神秘岛》。浅蓝色的硬壳封面上，印着非常精美的铜蚀版画，正是赛勒斯工程师与伙伴们在岛上山洞里看见诺第留斯号浮出水面的画像，一道白色的探照灯光照亮周围的黑暗，几个在黑暗中惊慌失措的人……我拿著书，四周看了看，心里很无奈地犹豫着，嘴里却说，这是什么书？说着赶紧翻了几页，能看一行内容也好啊！翻开书，正好看到一行字：

凡祈求，必得到；寻求的，必寻见——这正是岛上的落难者得到一本《圣经》时，读的第一句。当然，我还要等很多年以后才能理解这句话。

这么厚的书，肯定是大毒草！那个和我一块抱书过来的同学说。说着就要伸手拿这本书，往火堆扔。

我赶紧说，我来我来……便恋恋不舍地扬手，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从我的手里飞向火堆……我能感觉到它的封面滑过我的手掌，滑过手指、指尖，它在空中翻滚着，书页张开，被热气吹拂着翻腾，它划出一道曲线，落进火堆，霎时间就被大火吞没了。

□ 原载《华尔街日报》  
~~~~~

【史海钩沉】

首都红卫兵三司司令朱成昭

• 张蕴章 •

一提起文革，就会说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几十年来，谣传“三司司令”是王大宾或者蒯大富，三司真正的司令是朱成昭。

朱成昭，安徽人。1942年生人。其父在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一个副局级老干部。他1960年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当时是整个上海乃至全中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在上中，他是品学兼优的团干部，好学生。以至一毕业，中国科学院因一个在计算机方面尽快赶上西方的秘密计划，直接把他抽到上海的计算机研究所工作，作为未来的专家培养。朱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已经担任了课题组长。然而在工作中他感到了自己在科学基础知识的贫乏，决定再去读大学。受到当时在上中最为流行的《勘探队员之歌》的影响，他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因为他是从工作岗位上再来读大学，就变成了“调干生”。1962年入校后，正值阶级斗争之风盛行，朱和不少同学一起被两次派出参加“四清”。

1966年6月文革爆发，朱成昭是地质学院水文系四年级学生。他和一些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同学一起给以邹家尤为首的地院工作队提了一些意见。被划为“第三类学生”，在工作组整的黑材料中已经定下“送去劳改”。当时的工作队付队长边固在一次对“第三类学生”的训话中竟骂他们：“共产党养你们比养一群狗还不值！”朱成昭和蒋良朴、田春林、梅建明等同学一起被逼上梁山，7月份揭竿而起“造反”，8月8日成立了地院“东方红公社”。因为朱和他的伙伴们在组织路线上不搞“血统论”，东方红公社受到绝大多数师生的拥护，很快成为地院的绝大多数派。

当时，北京有50多所大学，100多所中学。各个学校都成立了只准“红五类”参加的红卫兵。这些“红五类”专横跋扈，专整出身不好的同学。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学生们都是土改以后出生的，他们没有见过地主、富农什么样，于是就拿地主、富农的子女、孙子女开刀。到处抄家、打人、破四旧。这批老红卫兵的所作所为极不得人心。听说地质东方红不搞出身论，纷纷前来取经，回校后也成立了自己的战斗组织，和“老红卫兵”对着干。这些组织要求联合起来，成立全北京市的造反组织。

1966年9月6日，由朱成昭牵头，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当时，“首都三司”是北京近50所高校的约60多个红卫兵组织的联合体，总部设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太庙。

首都三司一成立，就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原来的“一司”、“二司”说话再也没有人听了。不仅全北京市各学校都有“三司”的支持者。首都三司在全国44个城市都设立了联络站。“首都三司”声音远远高过各地政府和党委。

“首都三司”不仅受到群众的拥护，而且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支持。毛泽东原来是支持老红卫兵的，这些老红卫兵只知道破四旧、斗出身不好的老师、同学，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斗到他的政敌。毛泽东多次接见朱成昭。有了“三司”毛泽东就不支持那些“老红卫兵”了。周恩来办事很稳重，那些“老红卫兵”年轻、幼稚、乱打乱砸，太让总理操心了，不如“三司”听话。中央文革也支持“三司”，许多他们想做又不方便做的事情就鼓动“三司”的人去做。

文革初期，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李纳同时又是毛泽东的联络员，在各大学造反派之间穿梭，行踪不定，中央文革的人总也不知道李纳整天去哪儿。那时没有手机，每当毛泽东或者江青要李纳回家，电话打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人就找朱成昭。找到朱成昭就找到李纳了。

首都三司从来没有设立过“司令”一职，朱成昭只是三司的发起人、总负责人。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组织“毛泽东主义战斗兵团”的头头叶向真是朱成昭的追求者。叶向真是文艺界的学生领袖，三司的发起人之一，中国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音乐学院都听她的。叶向真的另一个身份是叶剑英的女儿。一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朱成昭和叶剑英同坐一辆车。朱成昭叫了声“叶元帅”，叶剑英说：“你才是三司司令呀。”这才有了三司司令一说。

当时蒯大富仍然在清华大学受压，藏在地质学院。李纳找到蒯大富要他回清华成立组织，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多次要朱成昭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朱成昭派过一支地院东方红的战斗队去清华帮助蒯组织队伍。为了树立蒯大富的威信，朱成昭又请蒯担任三司的副手，这便是蒯大富是三司“蒯司令”的流言的由来。

地质东方红成立后第一个战役就是到地质部绝食静坐。跟北航“红旗战斗队”到国防科工委“请愿”相类似，而且一去就是四次。

第一次是8月23日，去了一千多人，逼得邹大尤（原地质学院工作队队长）不得不在第二天到地院接受批判。但随后他们就觉得对邹“太客气”了，而且认定走修正主义路线的是整个地质部领导层，于是又有了9月5日的第二次。然而，这第二次却跟另一起也想独占地质部“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在9月7日就发生了武斗，在地质部呆了15天后不得不主动撤走。10月8日，他们又三进地质部。为防止“西纠”抢夺胜利果实，把主管地质部工作的党委书记兼副部长何长工也绑架回学校秘密关押。10月24日，他们又四进地质部，这次去了三千多人，而且联合地质部内部的造反派，把地质部的领导干部全部打倒了。

“四进地质部”，令“地院东方红”声名大噪，朱成昭、王大宾等受到了毛、林、周、康及中央文革成员的接见。其实，朱成昭在地质部静坐时李纳就在场，毛泽东对朱成昭四进地质部的情况了如指掌。

地质东方红的最大“功绩”是从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

过去流传的说法是，1966年12月，江青到北京地院时曾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精神，将来好回来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于是，朱成昭马上派人前往成都。不久，消息传到了北航，郭爱晶也派人前往成都。

据当时亲身经历者回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在人大会议楼的一个小型会议室里。中央领导人召见首都红卫兵领袖。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多人，阵容与往来的重大接见没有什么两样。被召见的红卫兵头头只有聂元梓、朱成昭、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叶向贞、聂树人七人。这次会上江青说：“你们不是很能吗？你们为什么不去抓海瑞？听说他在四川经常上街看大字报，与人谈话，很逍遥自在么！应该把他抓回来，要他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海瑞”指的是彭德怀。也都知道，江青在这场合说这话是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会后，朱成昭接到周恩来的秘密命令，派人把彭德怀从四川抓回北京。

朱成昭曾派了三批人去成都。第一批王大来、钱信等人在12月15日进入成都彭德怀的住处，与彭就文革以及党史上的一些问题有过长谈，结果被彭感化，认为彭讲的都是“真话、实话”。最后对彭同情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可能现在不了解彭现在的情况，他们有责任把彭目

前的情况和他们的看法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汇报”的地步。王大来回京向朱成昭汇报，决定阻止抓彭。

第二批是当时东方红公社的第三把手王大宾，于12月18日到达成都。王大宾也见到了彭德怀，他和第一批抓彭成员一起回京与朱成昭商量，决定阻止抓彭。因为朱成昭的安徽老家“三年自然灾害”中也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朱成昭对彭德怀一直持同情态度。朱成昭他们把在四川时与彭的谈话记录交给了中央文革，被训斥为“严重政治错误”。

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又给韩爱晶打电话，让韩爱晶马上派北航红旗的人赴川抓彭。在这种情况下，朱成昭派出第三批胡乐成等100余人去成都，结果彭德怀被韩爱晶派来的人抓走了。幸亏首都三司在成都的势力很大，在四川三司势力的配合下，胡乐成硬是从北航红旗手里抢回了彭德怀。这是地派和天派的一次大交火。

朱成昭请示了周恩来，周恩来安排了一节软卧包车，12月27日，王大宾、胡乐成把彭德怀押解到北京，成都军区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派了六名解放军一路护送。到达地院后，朱成昭怕天派的韩爱晶来抢人，把彭德怀安排住在自己的房间过了一夜。有人说朱成昭和彭德怀彻夜长谈，有人说朱成昭看了彭德怀随身携带的小箱子里“机密材料”，那是他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逐条反驳，以及对大跃进的保留看法等等。朱成昭仔细地看了这些材料，受到震动。这对他和他的伙伴们转变对文革的看法无疑有极大影响。他们一致认为：彭说的都是“实话”。第二天，朱成昭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彭德怀送到北京卫戍区保护起来。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朱成昭召集叶向真、蒋良朴、王大宾等三司头目在梅建明家连续开“黑会”，谈出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准备公开炮打中央文革。王大宾在会上持反对意见。不料有人偷偷向中央文革告密，67年1月23日，陈伯达写批示给朱成昭，警告他：“不要掉到茅厕里去，成为茅厕里的石头”。朱成昭、叶向真一直怀疑是王大宾告的密，王大宾一直否认。

中央文革让朱成昭做检查。朱成昭决定以“检查”为名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2月4日，朱成昭在地院作公开检查，因为这是首都三司“司令”的检查，共有3万人参加。（当时，能召集三万人开会的恐怕只有首都三司。）朱成昭在会上谈了他的“八大观点”：1）大串联搞乱了全国；2）整风军训实无必要；3）中央文革运动群众；4）中央文革抓人太多；5）中央文革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6）中央文革太左；7）在军委和中央文革之间，站在军委一边；8）大联合大夺权早了。

在中央文革不可一世的年代，朱成昭能旗帜鲜明的反对中央文革，特别是能看清林彪和中央文革的矛盾，借中央军委名义反对中央文革。朱成昭的远见卓识令人佩服。

由于朱成昭借“检查”为名系统“放毒”，这反而影响了很多对文革有怀疑的群众。2月8日，中央文革阎长贵到地院宣布这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朱成昭被勒令“闭门思过”。从此，王大宾取代了朱成昭在地质东方红和首都三司的位置。

1967年7月，朱成昭和叶向真南下广州，被戚本禹诬蔑为：“偷了地质部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当时，从广州偷渡到香港的有十几万人。有偷渡成功的，像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就是那时从香港去美国的。有被抓回来的，定反革命叛国罪，判刑15年到20年。

朱成昭叛逃惊动了中央。一来朱成昭是全国最大的威望最高的红卫兵组织的总司令，全国各地都认为首都三司代表中央，朱成昭叛逃无法向世人交代。二是朱成昭带走了叶向真，叶向

真不仅是首都三司的红卫兵领袖，还是叶剑英的女儿。

周恩来亲自出马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抓到广州把朱成昭和叶向真抓回北京。朱成昭、叶向真和许多三司领袖被隔离审查。有的三司头头被逼跳楼自杀。朱成昭没有害怕，在他8月15日所写的《我的检查与交代》中，提出担心全国武斗以及两派分裂将会在文革后造成经济 and 人心两方面的“极大后遗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当时难得的真知灼见。

1967年8月20日，朱成昭和叶向真被公安部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名正式逮捕，受株连者多人。“地院东方红”第四把手杨雨中被审查时跳楼自杀身亡。

朱成昭被关押了8年以后，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劳改农场作为反革命分子劳动改造。在长达10多年的牢狱和劳改岁月中，他一直把叶向真当作自己心中至死不渝的恋人，还写了许多动人的情诗。“何处觅向真，北京监牢中。坐牢不要紧，真理有认同。咫尺天涯远，相见在梦中。醒来望明月，牵手越秀丛。”

朱成昭没有想到的是1972年林彪事件后叶剑英主管军委工作，周恩来说服毛泽东释放了叶向真，条件是叶向真承诺和朱成昭断绝关系。

粉碎四人帮后，朱成昭在1980年6月正式平反。

当时据说中组部（由胡耀邦负责）准备树两个反文革的典型。一是死去的张志新，二是活着的朱成昭。但是最后被叶剑英一笔勾去，理由是活着的树典型不好。

1985年朱成昭被分配到苏州江苏省第四地质水文大队工作。90年代初他在上海下海，组织过私人的建筑公司，负责地基打桩。据他说：“一开始事业做得比当年地院东方红公社还大”。但是最后被“三角债”活活拖垮。

最后，朱成昭退出商界潜心研究文革了。

1998年9月，饱受磨难的朱成昭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时年57岁。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